

余治平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委员、常务理事，上海领军人才。复旦大学哲学博士（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2005），香港中文大学、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柏林自由大学（FUB）、日本北九州岛大学访问学者。已出版《唯天为大》、《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董学四贴》（中文版、日文版）、《春秋公羊夷夏论——儒家以文明教化为本位的一种天下秩序设计》、《周公酒诰训》《忠恕而仁》、《哲学的锁钥》、《中国的气质》、《万集乡下这些年》等专著。



修订本自序

我的这本书,《春秋公羊夷夏论》,2014年第一版出来之后,收获到的最大认可和赞许就是,自古以来第一部能够把“夷夏之辨”说得这么酣畅淋漓,阐发得这么通透明快的精专之作,不是在追溯和描述学术史,而是直接面向问题本身展开自己的叙事逻辑与架构,无疑是公羊学研究的一大学术进步,这其实也构成了我的强大自信。而所遭遇到的最大误解就是,说我反对西方现代化、反对现代文明,而这恰恰最不符合我的本意。我以公羊家的一个专门话题——“夷夏之辨”为切入点,引申比较一下中西两种文明方式的差异,而发现,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尽管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度、思想已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但它也有值得检讨和警惕的一面,它从一开始就以消耗地球非常有限的物质资源为前提条件,其展开过程注定要充满火药味与血腥气。现代化在其发端的欧洲地缘上肯定满足不了它的资源供给,必然要满地球寻找殖民统治基地,因而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现代文明是一种没有刹车系统的文明,它在出发点上就是为了满足并膨胀人的欲望,而不是做出必要的限制,其总体追求是趋利的,其所导致的后果便是完全打开人类的所有感官系

统和知觉功能，吊起胃口，一发不可收拾，因而欲壑难填，为所欲为。也因为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没有为自身设置过任何行为规范和终极价值，放逐的人类精神始终找不到一个德性收口，没有一种终极的归属感，挑战自然，征服天地，永无止竭，于是便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这种恶性的负面效应也非常真切地构成了现代性最严重的短板。指望在现代文明系统内部寻找到一种理性的、可以自己限制自己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解毒剂还需在外部借鉴和引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则是一种向善的文明，包容而内敛，友好而自收，没有占有欲望和领土觊觎，也不给别人带来痛苦。古老的中华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强调用礼法教化限制人心内里的欲望，不禁绝，也不放纵，有张有弛，使用适度，与自然对象始终形成共生同在的一体，与天地万物为友而不是为敌，这种文明才是有前途、有未来的。现代化虽然强劲有力，快速有效，但其持续发展也面临各种问题；儒家文明尽管向善、有德，却柔弱乏力，而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同，这就是人类历史走到今天所面临的尴尬与困顿。我没有丝毫这样的意思：因为现代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就不主张中国继续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相反，在我看来，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中国而言，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现代化只可经过，不可跳过。当前的中国是现代化的力度和程度都不够，而如果拒绝现代化，中国则有可能失去发展壮大的有利时机，进而有可能被剥夺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资格。

这次修订，最为明显的结果就是，繁体字全都转为了简化字，而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因为繁体字的阅读范围往往局限于非常狭窄的专业人群，而简化字则便于面向大众，利于向社会普及；修改了全书的引文脚注和参考文献，使之更符合所谓学术论著标准化的格式要求；增写了“夷夏古论”卷四的第六节“许夷狄者不一而足——‘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一万四千多字；附录了我发表于《江海学刊》2012年第1期“头版头条”的论文《夷夏之变与文明超越——春秋公羊学

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和南京大学哲学系翁后发博士所撰的一篇书评,即《儒家“夷夏论”的当代回归及其对中华文明重构的建言——读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一书》。至于书中词语、句子的改动,尤其是涉及领袖人物、重要事件、对外关系、敏感问题的表述,皆遵嘱而做了改动乃至删节,这里不必一一列出。许多改动姑且算作一种历史印迹,其微言大义,只有期待读者阅览时自行体会了。

初版以来,争议最多的部分是“夷夏今论”卷九“新霸权主义”一章,但也没法作伤筋动骨式的修改,因为七年前的我,对美国、对中国、对西方、对气候政治,的确就是这么认识和这么理解的,这也非常真实地构成了我个人的学术史印迹。必须承认,今天已不复当年,许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当年的我还抱有希望,愿意往好处想,也愿意说点好话,多少也受到姚洋、韩毓海、黄纪苏他们一拨人的思想启发和影响。为了紧跟形势,一些文字和数据如果改了,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篇章结构都得动,太麻烦。实际上我现在的心境已经大不一样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甚至在这本书初版后的一两年之间就有了很大的反转和彻底的改变。

承蒙交大文科建设处把这本旧作的修订本列入“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并予以资助初版,这才促使我抓紧修改,否则这本书的再版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拥有“巍巍交大,百年书香”之美称的交大出版社,其责编李阳女士兢兢业业而辛苦付出,很值得我永远铭记在心。她对书稿的阅读、审查,是相当认真的。春秋公羊学论著,连治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都觉得十分难啃,她却能够坚持读完一整本书,不得不钦佩其毅力超群、耐心卓著,这是我迄今所遇见的最负责任的编辑。当我从她手中接过被她审查过的一摞书稿时,就猛一震惊:在这个地球上竟然还有人这么严肃而庄重地对待我这本书的每一个文字!我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密密麻麻的彩色纸条夹遍全书,从遣词造句到思想内容,从标点、序号到阿拉伯数字、甲骨文、篆文,再到版面格式调整……圈圈杠杠,各种标记,无不浸润着李老师的汗水和心血。在这个

浮躁得不能再浮躁的年代里，如此把事当事，如此沉得心绪，如此细致而扎实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以至于我不得不谨向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感谢。

八年前，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两位仁兄在百忙中分别为小著撰写推荐语，皆对我的学术努力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置于封底，可谓长脸、壮胆，并且助威。初版匆忙，连《后记》都没来得及添上，现在出修订本终于有机会致以感谢了，算是补救，于吾心而略可慰藉。

余治平

2021年2月28日，海西浦东锺毓轩

引 言

孔子作《春秋》，其风格微言大义，隐而不显。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①唯有孔子能够将“拨乱世、反诸正”与“乐道尧舜之道”有机统一起来，既实现了自己的事业目标，又满足了人生的一大乐趣。但孔子为啥不直接写就一部王道大义的理论著作，如老子著作五千余言那样呢？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②上古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就已相当深厚，这一点孔子看得比谁都清楚。哲学叙事在中国往往行不通，因为它难以让更多的人感兴趣，也不能让更多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只有历史诠释才适合于中国，符合更多人的口味。知性真理借助于确凿而具体的历史活动才能打通天人之际，《春秋》一书融合

① 【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87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944页。

了事与理、形下与形上，让外王之道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中获得更为有效的呈现。

于是，借助于夷夏之辨和夷夏之变的充分展开，儒家亲亲、尊尊乃至王化、仁义一类的深刻道理才能够说得通透。春秋之前，夷之于夏似乎更多的只是地理上的区分，而并无太多的道德贬义与蔑视。《尔雅·释地·野》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①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说：“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②显然，这里的北狄、南蛮、西戎、东夷都是尚未开化的地区，后来则一概被称为夷狄，居住于其上的土著原本都是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部族。夷狄之人虽缺乏足够的礼乐教化，但大多骁勇善战^③，春秋之前间或侵扰诸夏中国，春秋之后则时常侵扰诸夏中国^④，所以到了孔子的时代，“攘夷”便不得不成为诸夏中国内政、外交的一大紧要问题。西周初建，周公虽兼夷狄，却没有天下一盘棋的客观要求和理念自觉，所以也并未就如何治理夷狄提出更多、更好的对策措施。及至春秋，作为“素王”的孔子，不仅治京师、治诸夏，而且还治夷狄，于是，不得不设计出一套天下格局的模型以解决燃眉之急。特

① 《尔雅·释地·野》，见周祖谟《尔雅校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页。

③ “骁勇善战”是不是也应该归入一种必要的文明素质，这在儒家内部似乎还有不小的争议。原始儒家具有尚武的思想传统，却并不任武，更不黩武，不相信武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后来被统治政权所利用了的儒家却明显具有拒武、斥武的倾向。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则可以发现，“骁勇善战”似乎也应该是先进文明的一种内在要求和正当结果，因为一个民族能够“勇”、善于“战”，起码说明它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动员能力、组织水平，还有必要的财富支撑和民意基础，否则，连一队像样的人马都拉不起来。于是，夷狄民族如果真的能够骁勇善战，说明他们也已经进入了文明人的行列，诸夏中国如果真的打不过夷狄，则至少说明在骁勇善战这一方面是有欠缺的，军事建设上落后了，应该及时补上这一课，而不是靠一味缩小文明概念的地域视野而把夷狄民族一概排除在文明行列之外。但另一方面，如果只具备武力，自身却没有成就出相应的仁性品格和道义素质，并且还时常对别的民族构成威胁和霸道，儒家则还是将其视为“夷狄”，仍属于一个野蛮力量。

④ 《公羊传》只称“诸夏”或“中国”，而并不连称“诸夏中国”。《公羊传》称“诸夏”，多指不同的诸侯国家，是现状描述；称“中国”，多指种族、文化、信仰上的一体不二，可能也含有未来期许的因素。诸夏目前虽裂分为许多不同的国家，但他们在历史上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在源头、根本处是统一的共同体，无可争议，并且，在未来或许仍将实现天子一统的格局。但我在本书中并称“诸夏中国”则属统称，主要出于集地理、种族、政治、文化与信仰意义于一体的考虑。

别是在《春秋》一书中，孔子就处理鲁国与诸夏的关系、诸夏与夷狄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被后世公羊学家们总结为“夷夏之辨”与“夷夏之变”的学说。

“夷夏之辨”与“夷夏之变”是春秋公羊学非常独特的思想，属于儒家外王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关乎儒家理想的天下秩序安排。显然，“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平等对待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以地缘亲疏关系为界限的地域划分问题，而始终是一个文明发展与礼教进步的问题，因此也才能够延伸出所谓“夷夏之变”的问题。《春秋》一经中，保存了大量关于贬诸夏、进夷狄的案例，目的就是要阐明夷狄进化于文明则可圈可点，而诸夏一旦丧失了仁义道德则蜕变为新夷狄的基本道理。《论语·八佾》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里的“如”一旦可以解释为“似”，那么为孔子所感叹的则是，现在的夷狄之邦尚且还能够保存君主、尊王的制度，而诸夏中国却纷纷陷于礼崩乐坏、犯上作乱、僭越无序、弑君弑父的地步^①。仁义道德应该是夷夏之辨最根本的标准。用夷变夏，用夏变夷，主要看礼乐教化在本邦、本族中能不能得到有效保存。从礼乐教化的角度看，诸夏中国与四边夷狄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可变的关系，谁都不是不可更改的。战火纷飞，兼并潮起，天下列国不断重新洗牌，但最终所成仍不失为一种善的格局。

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公羊传》所说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获中国”（庄公十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昭公二十三年），显然应该被理解为源发于孔子的一种保存中国种群、中国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的正当要求，因而也是一种民族意义、文化意义上的

^① 但钱穆却解释说：“夷狄虽有君，仍不如诸夏之无君。”（钱穆：《论语新解·八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6、57页）理由是，君臣只是礼之一端，社会可以无君，终不可以无礼。孔子撇开无君一节，谓夷狄终不如诸夏。明显与“夷狄有君长，不像诸夏之僭篡”相异。两说是非，当考订其语境差异，各取其可。所以董仲舒说“《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见【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清】乾隆三十八年聚珍本，页一五）

中国本位主义，而始终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学、人种学意义上的沙文主义（或后来所谓的大汉族主义）。上古先贤，唯有孔子明确为中国人立法，规定我们族群的王化、正义而非夷狄强盗之属性，使中国成为中国，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把我们的族群引上一条文明的、向善的通途，而不至于迷失在历史的漫长征程中。


攘除夷狄与尊王重礼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并汇入儒门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道德叙事传统中，否则，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四边少数民族之间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总体上亲密、和谐、长期稳定而非歼灭、吞并的关系史。然而，攘除夷狄与尊王重礼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攘除夷狄的前提条件是他们还没有开化，不懂得文明，而且还经常对我们构成严重的生存威胁，我们必须使自己首先获得拒绝野蛮的能力，而不是我们怀揣所谓文明人的话语系统，乃至狂妄与自负地去征服他们，也不应该是把属于我们的精神理念或我们自以为是、自认为好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们。《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赵岐《注》曰：“当以诸夏之礼义化变蛮夷之人耳，未闻变化于夷蛮之人，同其道也。”^①这不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早发性的霸权、殖民倾向，而只应该从积极保存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感，从一种健康的民族自觉意识的角度来予以认识。王道，而非霸道，这是儒家的道德治理比之于西方列强近代以来对全世界进行疯狂殖民统治的最大不同。

2010年的夏天，我初读戴旭的《C型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一书，内心震撼，为之拍案而又疑窦丛生，情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已经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善的生活方式”，却在近代莫名其妙地输给了刚刚兴起于西方的“利的生活方式”，而且输得还很惨。有错的横行霸道，没错的却败下阵来。这世间究竟还有没有天理？！我的祖先在属于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不偷，不抢，不打劫，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彪

①【汉】赵岐、【宋】孙奭：《孟子注疏·滕文公上》，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炳史册的文明，做子孙的还可以埋怨、指责他们没有为后代的发展开辟留有必要的地理空间吗?! 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其方式值得我们追捧吗? 它能有未来吗? 通过对儒家夷夏论的深度解读和钻研，才使我真正跳出戴旭的“圈套”。别人耍流氓，我们不能也跟着耍流氓，而干脆一时间抛弃自己好的教养和品格。当下中国的复兴再艰难、再困顿，也不能丢掉做“君子国”的风范和理想。秦王朝之后，中华君主制度绵延两千年，但始终没有发展、演变成为专靠征服、侵略、霸占、掠夺、欺压为基本存在方式的帝国主义，这并没有错，既然没有错，就实在没有必要弃明投暗、与贼同路。这样，我们就完全有必要重新寻找一种借鉴并接榫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并可对世界其他族群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明方式，从而真正实现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超越和扬弃^①。

^① 实际上，尊王重礼也具有普适价值的维度，它可以面向包括夷狄在内的天下所有人，只要地理概念上的夷狄民族已经具有了道德性和礼乐文化的特征，说明他们也已经成为文明人，而不再继续是化外的野蛮人了。而一当夷狄部族跃升到文明人的行列，就再也没有理由去攘除他们了，因为文明人是从来不打文明人的。



目 录

修订本自序.....	001
引言.....	001

甲 编 夷 夏 古 论

卷一 夷与夏	003
一、夷之为字.....	003
二、九夷.....	005
三、夷与尸.....	009
四、蹲踞.....	012
五、尸方.....	015
六、中国、华夏.....	017
卷二 诸夏、夷狄之内、外	025
一、“内其国”而王鲁.....	025

二、内大恶讳、小恶书.....	037
三、为亲者、尊者、贤者讳.....	040
四、内外异辞.....	045
五、外诸夏.....	055
六、内诸夏.....	067
七、外夷狄.....	072
卷三 夷夏大防.....	080
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80
二、夷狄猾夏.....	083
三、不与夷狄之主中国.....	090
四、不与夷狄之执中国.....	094
五、不与夷狄之获中国.....	103
六、攘夷狄.....	106
七、夷狄仇恨.....	116
卷四 夷夏之变.....	121
一、夷夏辨变.....	121
二、夷狄之.....	125
三、礼崩乐坏.....	128
四、中国亦新夷狄.....	139
五、褒之以中国.....	142
六、许夷狄者不一而足 ——“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154
七、整合人心，存亡继绝.....	170



乙编 夷夏近论

卷五 雍正皇帝的“中外一家”	179
一、用夏变夏	179
二、吕留良案	181
三、《大义觉迷录》一书	183
四、夷狄只是地理籍贯	185
五、版图决定华夷分野	189
六、华夷之别在人伦、在君臣大义	192
七、华夷之口舌相讥	195
八、华夷同禀阴阳之气	197
九、为政之本在德，不在华夷分别	201
十、明亡清兴，非夷狄篡窃	205
十一、华夷之辨有边际	208
十二、华夷之辨兴起，利害攸关重置	211
卷六 乾隆皇帝“立中外之大防”	214
一、中国恐受其累	214
二、马噶尔尼使团之碰壁	217
三、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	219
四、不惑于异说	221
五、不可不预为之防	222
卷七 “英夷”与“鬼子”	225
一、为大不正，为富不仁	
——以《中英天津条约》为例	225



二、“夷”即“barbarian”	230
三、中国≠China、“支那”	233
四、侵略者—鬼子	235
附录一 夷夏之变与文明超越	
——春秋公羊学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 余治平	238
附录二 儒家“夷夏论”的当代回归及其对中华文明重构的建言	
——读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一书 / 翁后发	252
参考文献	261
索引	265



甲编

夷夏古论

卷一 夷与夏

夷之为字

一字多义，是汉字之为汉字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妙处。夷字，显然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多义字，指涉广博，蕴涵丰富。

作为一个动词，夷可以指陈放、安置，《礼记·丧大记》曰“彻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①；也可以指平定、平息，《诗·大雅·瞻印》曰“蝥贼蝥疾，靡有夷届”^②；也可以指铲平、削平，引申为铲除、诛灭，《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塞井夷灶”^③，《国语·周语》曰“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④，《史记·吕太后本纪》曰“今皆已夷灭诸吕”^⑤；也可以指伤害、创

① 陈成国点校：《礼记·丧大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453页。

② 《诗·大雅·荡之什·瞻印》，见雒江生《诗经通诂》，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827页。

③ 《左传·襄公十四年》，见【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06页。

④ 李维琦标点：《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谏壅谷水》，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6页。

⑤ 【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117页。